

十七、十八世纪“四书”在欧洲的译介与出版

罗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四书”域外传播史是“中学西传”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经由梳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主要的“四书”译本、特别是《中庸》一书的拉丁文译本及其转译本,借助原始材料详尽地呈现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译介儒学典籍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在中拉双语译本的刻印出版方面的实践及其成果。

关键词: 四书; 中庸; 耶稣会士; 双语合刻本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2) 03-0034-08

一、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

作为教皇麾下“反宗教改革”的先锋力量,耶稣会在16、17世纪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抗衡当时新教势力范围的迅速扩张,其中就包括“图书馆策略”(Bibliothekenstrategie)^①。此后该策略被借鉴到远东传教地区,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在奉教文人的协助下,大量地翻译、编写布道书以及天主教教义手册,系统地制定翻译计划——其中既包括因应传教活动需要,为引进西方知识体系而进行的西书汉译活动,也包括下文将会详细论述的一系列汉书西译成果。在此基础上,耶稣会士还大量购买、收集图书并在传教地区建立图书馆,旨在更好地支持当地传教活动的开展以及满足传教士团体在学习、灵修、文娱等方面的需求。

1624年,时任耶稣会中国副会省省长的李玛诺(Manual Dias, 1559-1639)制定了来华传教士在语言文化训练方面的四年“研习计划”(ratio studiorum),其中明确规定了来华传教士都必须学习“四书”、《尚书》等著作^②。因应这一学习活动的需要,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始翻译“四书”,以便为新来华传教士提供研习中国经典所需的教科书。据利玛窦与耶稣会内部的通信记载,为了给刚来华的耶稣会神父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 1562-1593)教授汉语,他从1591年12月到1593年11月在韶州译成了“四书”并打算将它们寄回意大利的耶稣会总会^③,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 S.J.)和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都认为利氏的“四书”翻译可能成为后来几代耶稣会士集体译介“四书”的底本,并最终被润色、完善成为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Paris, 1687)一书^④。有关“利玛窦译本”藏于何处学界迄今还没有最终

定论,但很可能它只以手稿形式传世,后来经他人多方传抄得以留存并为新来华传教士所用。而伦贝克(Knud Lundbaek)则提到“四书”翻译最早可能始于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翻译了《大学》的开篇部分并收录在1593年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 1533-1611)在罗马出版的《选集文库》(Bibliotheca Selecta)一书中^⑤。无论如何,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耶稣会士“四书”译介的成果主要体现在1662年至1711年间四个刻印刊行的拉丁语译本,此后在欧洲还出现了一些由拉丁文译本转译而来的其他欧洲语言译本。其中,在17、18世纪的欧洲影响较大的译本是《中国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Guamcheu-Goa 1667/1669,该书是《中庸》的拉丁语全译本)和《中国哲学家孔子》(该书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三书的拉丁语翻译)这两个拉丁文译本,以及由之而来的一系列法语、英语节译本。

二、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主要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及其转译本

1. SAPIENTIA SINICA(《中国的智慧》——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本)^⑥

这是现今可见《大学》在欧洲最早刊印出版的拉丁文译本^⑦,封面上标注译者是耶稣会士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 1603-1666)和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1662年刊刻于江西建昌,封二则列出六位集体鉴定该书内容的传教士名单:聂伯多(Pietro Canevari, 1596-1675)、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和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以及最终批准该书出版的刘迪我(Jacques Le Faure,

1613-1675)。该书连同封面共计 51 叶（每叶计正反两面）：开篇是郎安德（André Ferrão, 1625?-1661）1660 年 10 月 25 日在福州为该书所作的序；第二叶是殷铎泽所作的序以及他撰写的《致读者》（Ad Lectorem）一文，简要介绍了“四书五经”的作者、内容以及耶稣会士在翻译时所用的中文底本是南京版的《中庸》，作者是朱熹，题为《四书集注》（“iuxta ordinem impressionis Nan-ki in editae Authore Chu-Hi, qui liber vulgo dicitur Su Xu çie chu.”）；第三、第四叶是殷铎泽所作的《中国智慧之王孔子的生平》（*Vita Confucii Principis Sapientiae Sinicae*）；之后是七叶的《大学》全文翻译和《论语》前五章共计 38 叶的译文，皆是中拉双语刻印。中文及拉丁文部分皆采取从左到右西式横向排版，每个汉字右侧标注有对应的拉丁字母注音，与该汉字直接对应的拉丁语译词也被标注了下划线，从而使得每一个汉字的音、形、义在这个文本中都得到系统的呈现。虽然该刻本印数不多，在欧洲的流传范围也很小——据考狄（Henri Cordier）和博克塞（C. R. Boxer）统计，现存的五个刻本分别藏于伦敦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维也纳皇家图书馆、意大利巴勒莫国家图书馆，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亦有一残本^⑧——但它巧妙地将汉字的音、形、义相结合，利用儒学文本的跨文化译介这一手段，将汉字独特的书写发音系统以及儒家经典的内容一并介绍到欧洲。

2.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中国政治道德学说》——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本）^⑨

这是现今可见《中庸》在欧洲最早被刊印出版的拉丁文译本。该书译者是殷铎泽，他在 1667、1669 年分别于广州和果阿刻印了该书的前后两部分。该拉丁文译本共有 32 叶（其中最后两半叶皆为空白），封面上标注了译者的姓名及身份：殷铎泽，耶稣会士，来自于意大利西西里。第二叶则说明了此书的使用者为耶稣会在华第五省值会的会士们，即该书是由他们负责翻译校对以及发行；之后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标注了 4 名批准此书发行的耶稣会士的姓名：郭纳爵、刘迪我、利玛弟（Matias da Maia, 1616-1667）、成际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以及对该书同时进行集体鉴定的 12 名会士的名字：何大化、聂伯多、潘国光、李方西（Gianfrancesco De Ferrari, 1609-1671）、洪度贞（Humbert Augery, 1616-1673）、聂仲迁（Adrien Greslon, 1618-1696）、穆迪我（Jacques Motel, 1619-1692）、毕嘉（Giandomenico Gabiani, 1623-1694）、张玛诺（Manuel Jorge, 1621-1677）、柏应理、鲁日满和恩理格（Christian Wolfgang Henriques Herdtrich, 1625-1684）。每个人名字的下方都标出各自所属耶稣会会院的所在地。

第三叶是当时在南京担任耶稣会中国副会省省长的成际理所写的一篇负责人的许可信。在他的声明中写道：

按照耶稣会在罗马的总会长（Superior General Giovanni Paolo Oliva）委托给我的权威，我授予耶稣会士殷铎泽神父该许可，由他来负责出版《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一书：这著作首先由郭纳爵神父、再由刘迪我神父，最后是利玛弟神父对该书内容进行审阅，经由这三位前辈的核实获得了耶稣会的确认，另外还有 12 位在中国很有名望的耶稣会神父给予集体鉴定和批准。我们认为这本书值得出版。在这些人的推荐之下，我亲手签名并给这盖上代表我职责的印章。^⑩

最后他指出该声明写于 1667 年 7 月 31 日的广州，也就是说从此时起这本书正式获得刊印发行的资格。据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S.J.）的记载：1666—1669 年成际理神父在南京担任副会省省长，这与他在声明中的陈述是相符的。1667 年 12 月 8 日至 1668 年 1 月 26 日他在广州召开了所有被流放的来华传教士有关礼仪和本地神职人员的大会，随后为了向教宗呈递 1668 年 1 月 26 日这次著名会议上选举中国传教会护教圣者的结果，殷铎泽被指派为在华耶稣会赴罗马向教宗报告会务的“中国差会代理人”（Sinensis missionis procurator）。他于 1668 年 9 月 3 日抵达澳门并于 1669 年 1 月 21 日离开澳门赶赴罗马，最终将选举结果送到罗马并获得教宗的正式核准。另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 S.J.）考证，殷铎泽的《中庸》译本是他于 1667 年“先刻一部分于广州，后二年续刻于果阿，故亦称为果阿本，后附《孔子传》。即该书后半部分的刻印是殷铎泽从澳门回罗马的航行中、途经果阿并于此地完成的。

第四叶是署名殷铎泽的一篇《致读者》的译者手记（“AD LECTOREM”），提及他翻译该书的目的：更方便、更快速地使自己的传教工作得到接纳，他也相信该书的出版是基于它可以在传教方面带来好处（“ut scilicet publico Missionis bono propius ac citius consuleretur”）。殷铎泽称《中庸》为坚定而平常的金律（“CHUM YUM, MEDII scilicet, seu AUREAE MEDIOCRITATIS CONSTANTIA.”），认为这本书是生活在曲阜的孔子的孙子（子思）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并把这本书公布，其中也增添了自己的某些解释，子思希望将孔子这位道德先师的思想告诉世人，让他的自然理性的光芒照亮罪恶的阴暗，犹如东方破晓般的恩宠，照射出真诚之光，照亮并指明了这块土地上的福音之路。（“naturali lumini uitiorum tenebris offuso, ceu aurorae beneficio, eam ueritatis lucem subministrat, quae Soli euangelico

praeluceat, uiamque pandat.”)但是,尽管子思为《中庸》融入了自己的解释,这本书还是显得有些残缺不全和意义不明。殷铎泽提到为了帮助读者解决阅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他参照中国官学为《中庸》所做的注解,往拉丁译文中增添了自己的一些解释。此外,在手记末尾,他特别对这本书中使用的一些符号进行了说明,比如中文和拉丁文黑体字、斜体字、标码、页码和阅读时的顺序等。他也提到了汉语语音的问题:因为口音的不同,所以汉语在声调上是有差异的,初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初学者“tyro”)可以通过记忆书中所记载的这些发音获得指导。他也提到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在果阿刻印(前半部分是在中国刻印的),其中译者自己所添加的修饰性文字被划在括号里,这是为了使文章的意思更清晰,其他字体较小的文字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被如此刻印。另外,他也解释了f.(folio 面)、p.(pagina 半叶)和§.(paragraphus 段落)这些缩写符号的意义。殷铎泽同样明确指出他翻译时所使用的中文底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

该书正文部分,前12叶属于广州刻印的部分,版面设计上采用的是中式刻印法:四周单栏,白口,单线鱼尾,版心上方书《中庸》二字,下方则标有页数;左叶书眉中央有手写拉丁文“Lib.2. Chum-yum”(第二本书《中庸》)字样,右叶书眉中央则写有“Versio Literalis”(逐字翻译,即直译之意)。每半叶左侧为拉丁译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列,行数和每行字数不定。上方有标号的黑体拉丁文是对《中庸》逐字直译的译文,斜体无标号的拉丁文是为了帮助理解而增加的译文(到果阿部分,作者增译的部分则被放置于括号中)。每半叶的右侧是《中庸》的中文原文,半叶计4行汉字,每行20字,文字的排列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黑体的中文实词在其右上方都有标号,与左侧的拉丁译文一一对应,没有标号的多为无实在意义的虚词,如“之”“也”“乎”等,每个汉字的读音标注在该汉字的右下角。每页上的文段以双圆圈分隔开,圈中有f.p. §.的符号,标明了这些语句在原书中(即在南京刊行的朱熹的《四书集注》)的位置,f.表示《四书集注》里该语句所在中式对开页上的页码,p.为该文字位于对开页面上的哪一半叶;§.则为该文在原书中所在段落的标记,有时是整个章句的翻译,有时只是一句话的翻译。

正文部分的后14叶属于果阿刻印部分,版面情况与广州版大致一样,唯该版版口无单线鱼尾,中文部分排列有变,半叶计4行汉字,每行17字(这也成为判断广州版和果阿版如何分界的一个明显例证),而拉丁译文与中文原文之间亦多一竖线将其隔

开,页面上隐约可见下一页的文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1) 据陈伦绪神父的推测这可能是单页双面刻印造成的;

(2) 由于书仍是中式装订,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果阿版的纸质较广州版的要稀薄,且刻印者出于时间紧迫、急欲完成等原因,在墨印未干之时即将之对折致使半叶上字的墨印都渗透显现到另一半叶上。半叶上无论汉字抑或字母不再有黑体斜体之分,且右侧汉字的读音和数字位置与广州版相反,读音在上而数字在下,且没有双圆圈分隔而只有简单标明语句位置的符号,为帮助理解而附加的部分译文改在括号中标出。

笔者猜测果阿版的刻印可能比较匆忙的原因还在于:一方面版面组织排列比起广州版显得略为粗糙、简易;另一方面是里面的数字标号有部分出错,这种情况在广州版中并没有发生。而在翻译拉丁文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果阿部分的拉丁文单词大量采用了17世纪的拉丁文单词缩写规则,这在广州版中也没有出现过,由此可见该书后半部分在刻印时间上的紧迫和刻印时的仓促^①。而这些与费赖之记载的情况亦可互证:殷铎泽“先刻一部分于广州,后二年续刻于果阿”。在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书刻印就因耶稣会的派遣而匆忙偷渡出境^②,继而在返回罗马的航行途中停靠果阿,殷铎泽在此匆忙修整并完成了后一部分刻印,并携带该书作为耶稣会在华活动的一项成果赶回罗马作为中国副会省的代表进行汇报。

经过校对耶稣会档案馆所藏、只在序言上标明了“1667年刻于广州”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和国图缩微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拉丁文版^③,可以发现两个版本在封面、许可声明、作者序言和《中庸》一书的翻译上完全相同,只是后者在《中庸》译文之后还多了8页的拉丁文《孔子传》,并且在最后一页加盖了殷铎泽的印章以及“1669年10月1日于果阿再次确认这本著作的编撰并获准出版”(Goae Iterum Recognitum, ac in lucem editum. Die 1. Octobris. Anno 1669. SUPERIORUM PERMISSU.)的字样。因而笔者认为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的应该是殷铎泽原著的一个残本,原因不详。而据费赖之的记载,这本拉丁文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也应该是“后附《孔子传》”的^④。

3.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本

该书的内容及排版与上述耶稣会藏本完全相同,

但最后多出 8 页拉丁文《孔子传》¹⁵。伦敦大学的藏本是最为符合费赖之、陈伦绪等人所作文献记录的完整版本。

4.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¹⁶ (《关于各种奇异旅行的报道》)

1672 年, 当时法国宫廷图书馆馆长德维诺 (Melchisédech Thévenot, 1620-1692) 在巴黎出版了他著名的游记报道, 该书第二卷第四部分收录了《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一书全部的拉丁文翻译, 而原书的中文和注音部分则被全部去掉; 在拉丁译文后面是一个法语简介 (“AVIS”), 介绍了殷铎泽在“译者手记”中提及的翻译动机以及《中庸》一书的作者、主要思想等, 似是为了方便当时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写; 之后是从拉丁语转译成法语的《孔子传》 (“LA VIE DE CONFUCIUS”) 以及节选《中庸》的部分拉丁译文转译成法语 (“Version de quelques endroits du second livre Confucius”)。该法语转译版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远比殷铎泽中拉合刻的原书在欧洲更为知名、影响更大。

5.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¹⁷ (《中国哲学家孔子》)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为西式精装对开本, 在巴黎经由活版印刷 (“Parisiis: ex typographia Andreae Cramoisy Parisiensis typographi”) 于 1687 年出版。该书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 或者说是用拉丁文来展现中国的智慧》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标题下面是四位耶稣会译者的署名: 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和柏应理。

扉页上特别标出该书是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 (“JUSSU LUDOVICI MAGNI”), 于法国宫廷图书馆面世 (“E BIBLIOTHECA REGIA IN LUCEM PRODIT”)。或许由于该书出版的资助方是法国皇室, 因而与在华耶稣会通常的出版惯例不同, 书中以一封署名柏应理、以个人名义撰写的致法王路易十四的感谢信, 取代了通常耶稣会在出版物扉页需要标注的“值会”名单 (即主持该书出版、校对审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集体鉴定者的名单, 以及由会省负责人撰写并署名的出版批准声明。此外, 扉页上也标明了该书的出版人姓名 (Daniël Horthemels)、出版地址 (via Jacobaea) 以及出版时间 1687 年 (“M. DC. LXXXVII. CUM PRIVILEGIO REGIS”)。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内容包括: 柏应理所写的《致伟大虔诚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 (Ludovico Magno Regi Christianissimo Epistola)、殷铎泽与柏应理合著的《初序》 (Proëmialis Declaratio)、

殷铎泽所作《孔子传》 (Confucii Vita) 并附孔子像、《大学》 (Liber Primus)、《中庸》 (Liber Secundus)、《论语》 (Liber Tertius) “三书”的拉丁文全译本、柏应理所作的《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和《中华帝国及其大事纪》 (Imperii Sinarum et Rerum In Eo Notabilium Synopsis), 并附柏应理绘制的中国地图。由于受到当时欧洲刻印技术水平的限制, “三书”手稿译文中所有的汉字在印刷出版时都被取消, 只保留了拉丁译文部分, 所以最终的成书中没有出现任何汉字。该书介绍到欧洲的孔子及儒家思想成为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欧洲启蒙思想家以之反观、审视欧洲文化, 从而建构起自己新的思想学说的重要“他者”形象。

6.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¹⁸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

1688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作者匿名。该书为西式 8° 版本 (约为 15×10 厘米), 书中收录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法语节译本, 语言通俗易懂。该书主要内容包括: 引言 (“AVERTISSEMENT”) 和正文。正文又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历史、古代历史人物以及哲学思想 (“De l'Antiquité et de la Philosophie des Chinois”); 第二部分是《大学》、《中庸》和《论语》三书的节译 (“Recueil des Ouvrages de Confucius”); 最后还翻译了 80 条中国哲学箴言 (“MAXIMES”)。

7. *Notizie Varie dell'Imperio della Cina e di Qualche Altro Paese Adiacente con la Vita di Confucio*¹⁹ (《各种关于中华帝国及其相邻国家的记载, 并附孔子传》)

该书的编著者为加里耶利 (Jacopo Carlieri), 1697 年出版于佛罗伦萨。书中收录了殷铎泽所作的拉丁文《孔子传》和《中庸》译文。

8.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²⁰ (《中华帝国六经》)

该书译者是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 (François Noël, 1651-1729), 1711 年出版于布拉格。书中收录了“四书”以及《孝经》、《小学》的全部拉丁译文, 是欧洲现今可见最全的“四书”西文刊印本。卫方济书中的《中庸》翻译——其他“三书”的译介情况亦是如此——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 开篇是题为《致读者》 (“LECTORI”) 的译者手记, 简介《中庸》一书的书名、作者、成书史及其在后世的影响; 之后是一篇 “Doctor Chu Hi” (即朱熹) 为《中庸》所作的序言 (“Commentarii in Immutabile Medium PROOEMIUM”, 亦即《中庸章句序》) 及《中庸》的全文翻译 (“IMMUTABILE MEDIUM”)。卫方济在这里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翻

译了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及《中庸章句》，并在部分重要章节也加入张居正的解释。该书的出版对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 *REGIOMONTANI ... 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eraturae Ratio Expliatur*^①（《汉语博览》）

该书作者是巴耶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1730年出版于圣彼得堡，书中收录了殷铎泽所作的拉丁文《孔子传》。

此后，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也倾力颇多，只是比起“四书”，他们更为重视“五经”的译介。

三、来华耶稣会士译介儒学典籍的动机 以及刊印实践活动

来华耶稣会士西译“四书”并在欧洲刊行其译著，一方面是将这些译著作为在华传教的成果，展示给罗马教会；另外，考虑到其译作的主要受众是当时17、18世纪的欧洲民众以及那些即将来华的欧洲新传教士，其翻译动机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包括以下这些：

1. 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都是建立中国本土教会的积极倡议者，他们先后作为“中国副会省的差会代理人”（*Sinensis missionis procurator*），前往罗马向教皇汇报教区工作。他们在旅行中都携带了大量中文书信，其中也包括耶稣会士翻译的“四书”刊印本，其目的在于：请求教宗批准在华耶稣会可以吸纳、培养中国的本土神父并用中文做弥散，只有这样耶稣会才能长久地保存在华福音传播的成果，而不至于因为此起彼伏的教案以及外国神父被驱逐出境，致使福音工作中断；而通过拉丁译文来展现儒家的丰富思想也可以有力地证明：归化如此一个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修养并且有丰富政治智慧的民族，将会对基督宗教的弘扬有莫大的光耀作用。

2. 向西方民众介绍中国儒家的“政治道德”思想，一方面是借此显示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并在欧洲为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针、尤其是为耶稣会在礼仪之争中受到的责难辩护，显示耶稣会宽容中国民众祭祖祭孔的依据以争取欧洲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耶稣会以招募更多来华宣扬福音的耶稣会士。

3. 吸引欧洲贵族以及知识分子对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关注，从而为在华传教活动筹集更多的资金、赞助。

在双语书籍的刊印出版史上，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扮演着中拉双语排版及刻印出版方面的先驱

角色。尽管据历史学家纳奇德（Oskar Nachod）考证，早在1570年于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就已出现了少数汉字^②；此后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c. 1540-1617）的名著《大中华帝国志》（*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1586）、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的《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Amsterdam 1659）等书中也出现了少量汉字的刻印，但真正实现大篇幅汉字刻印的还是在殷铎泽与郭纳爵题为《中国的智慧》的《大学》译本，尤其是在殷铎泽后来题为《中国政治道德学说》的《中庸》译本。他借助中国传统的木板刻印技术以及身边中国教友的协助^③，创造性地将中式竖行排版以及西文横行排版相结合，在直译的基础上还按照耶稣会内部使用的罗马字母注音系统为每个汉字标注了发音。殷铎泽不仅成功实现了中拉双语文本的印刷刊行，同时他的双语刻印本也系统地将汉字的“音形义”介绍到欧洲。

此后，柏应理继殷铎泽出任“中国差会代理人”，前往罗马汇报教务工作并计划出版他参与翻译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亦即后来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但是，受限于当时欧洲还无法实现汉字字模的铸造，他被迫取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汉字的出版——莱布尼茨曾经非常期待该书汉字部分的印刷出版，多次写信询问该书的出版进度，当他得知汉字部分的出版被取消时，莱布尼茨也颇为失望^④；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 1622 - 1701）在他的《拉中小辞典》（*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i-Characteristici*, Nürnberg, 1685）以及《简明中国编年史》（*Kurtze Chinesische Chronologia*, 1696）书中，借助木板刻印技术实现了汉字在欧洲的刻印，但是刻印效果不佳，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阅读后嘲讽这些汉字字形“扭曲”^⑤；巴耶尔在其《中国博览》一书的《汉语词典》部分，借助铜铸字模刻印了2251个汉字（其中有部分汉字重复出现），但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当时欧洲的评价家都对这些汉字的刻印效果很不满意^⑥。直至18世纪后期，伴随着欧洲字模技术的不断完善，西文著作中汉字的刻印水平才得到显著提高。

*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2YJC720019）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 释

① Noël Golvers. *BUILDING HUMANISTIC LIBR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irculation of Books, Prints and*

Letter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XVII-XVIII cen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 Roma-Leuven: Edizioni Nuova Cultura, 2011, p. 24.

- ② Liam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66; 此后,南怀仁神父在信中也提到:耶稣会在澳门的圣保罗学校沿袭的是耶稣会在欧洲的教育制度,来华耶稣会也曾设想对此进行改革,用中文经典的学习取代对西文经典的学习,但从未实现过,详见:Noël Golvers. "An unobserved letter of Prospero Intorcetta S.J. to Godefridus Henschens S.J.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Jesuit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Antwerp, 2 June 1672)". In *Syntagmatia Essays on Neo-Latin Literature in Honour of Monique Mund-Dopchie and Gilbert Tournoy*.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79.
- ③ 孟德卫在其《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一书第8章有关《中国哲学家孔子》所作介绍中提到:在利玛窦、金尼阁所著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Ricci-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书中第344页和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 Elia)的《利玛窦全集》(*Fonti Ricciane*)第一册第330页和第二册第33页都提到了利玛窦翻译“四书”。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第46页也谈到“一五九三年(利玛窦)曾将中国《四书》转为拉丁文,微加注释。(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五七八页。)凡传教师入中国者,皆应取此书译写而研究之。此书是否印行,抑尚存有写本,未详”。
- ④ 孟德卫和德礼贤神父都根据自身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各自推论出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是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底本,但是德礼贤比孟德卫更早提出来这一点,详见:Pasquale D' Elia. *Fonti Ricciane II*.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p.33; D.E.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250; D.E.Mungello. "The Seventeenth-Century Jesuit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In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28-177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52.
- ⑤ Knud 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 In *China Mission Studies(1550-1800)* Bulletin, I. 1979, pp.1-11. 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找到了Antonio Possevino 1593年在罗马出版的 *Bibliotheca Selecta* 一书,书中第九章确实发表了一段来自罗明坚关于德行教会的文字,文中所引的拉丁译文来自一本中文书(*Liber Sinensium*),据内容可以明确判断是《大学》的开头部分。有意思的是文中并没有明确说是罗明坚翻译了这段文字,但屡次提到罗明坚通过多年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学习,最终编成了一本中文的教义手册。此外,伦贝克的看法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德礼贤神父在《利玛窦全集》中所表露观点的影响。而值得注意的还有:德礼贤神父本人在1936年曾经对罗明坚翻译过“四书”提出过异议,认为以罗明坚当时的汉学修养还无法达到翻译“四书”的水平,进而推测是罗明坚将利玛窦所译的“四书”以及他抄写该作品的日期一同抄录下来带回了意大利。参见罗马伊曼努尔二世国家图书馆(Fondo Gesuitico=FG)手稿(3314)1185封面上正反面的笔记。可是后来,当他于1942年出版《利玛窦全集》时却又坚定地指出罗明坚曾用拉丁文翻译过“四书”,参见:《利玛窦全集》(FR)第一册,第43页,注释2。意大利学者达莱利(Francesco D' Arelli)认为现收藏在意大利罗马伊曼努尔二世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耶稣会、编者署名罗明坚的FG(3314)1185拉丁文“四书”翻译手稿其原作者是利玛窦,至少该手稿中的一至三部分和第五部分的作者是利玛窦。对该手稿的真正作者究竟是利玛窦还是罗明坚的探讨,迄今还未有最终结论。
- ⑥ 关于该书版本的详情,可参见: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pp.476-477.
- ⑦ 耶稣会档案馆将该书与下文将会提及的《中庸》拉丁语译本《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同置于题为《西文四书直解》(*Jap-Sin III, 3*)的档案中。根据殷铎泽的个人书信以及后来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等人在其书中多次提及的“殷氏的双语排版”方式,可以推断这些刻本同属殷铎泽所创中拉合刻法的早期作品。通过比较1662年刻印的《中国的智慧》以及1667年刻印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两部著作,可以看到殷铎泽在此期间不断地修改完善双语合刻书籍的版面设计。
- ⑧ C. R. Boxer. "Some Sino-European Xylographic Works, 1662-1718".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2 (Dec., 194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9-202 以及 Henri Cordier. *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1, p.17.
- ⑨ 关于该书的拉丁文版本,笔者所亲见的有两个:一个是张西平教授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带回的1667、1669年广州、果阿合刻本,该书被归于《西文四书直解》卷中(*Jap-Sin III, 3. 3a, 3b*)。关于此版本的详情,参见: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pp.477-479; 另一个版本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胶片上1672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拉丁文版,该版本与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的版本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中庸》译文之后还收有8页的拉丁文《孔子传》,最后一页也加盖了殷铎泽的印章以及1669年10月1日获准出版的字样。参见John Lust.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1987, No.732。可以断定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中国政治道德学说》是一个残本。
- ⑩ 笔者译自《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书中“FACVLITAS R.P. Viceprovincialis”部分。
- ⑪ 对于这本书陈伦绪神父和Lust目录中都有详细的版本描述,其描述与手头的这一版本的情况相符。详见英国伦敦大学Lust目录第732条。
- ⑫ 笔者猜测:此次动身的时间有可能也出乎殷铎泽本人的意料,并不是他自己事先决定的。对此的证明就是书中广州刻印部分结束的地方是在一句话的中间,而果阿版开篇就是接着刻完了这句话的原文和拉丁译文。当然,这也可能是出于木板整版刻印以及节省印刷的费用和时间等方面的考虑,为了刻印上的方便和节省,必须动身之前恰好结束一个版面两个半叶的印刷,等到下一个歇脚处再开始下一版面的刻印。
- ⑬ 缩微胶片抬头写着该版《中国政治道德学说》是16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但书中并没有关于该次出版的时间、地点的文字说明或者印章记号,虽然同年在法国巴黎确实出版了一法文版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即

Melchisedec Thévenot 在巴黎出版的著名游记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中的第四部分,其中也包括了一个译成法语的《孔子传》。现不能确定 1672 年在巴黎是否确实再版了殷铎泽拉丁文版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并在同年 Melchisedec Thévenot 也出版了他的法文版翻译,还是说藏书过程中有误,混淆了该拉丁文版与更为知名的法文版的出版时间和地点。

- ⑭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 331 页。另外笔者在此需指出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一书在第 134 页和第 279 页史料记载有误。在第 134 页作者写道:“耶稣会最终决定将殷铎泽于 1662 年翻译的《论语》和《大学》的合集《中国的智慧》并成一个较大的版本,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说》,用于东亚的传教。而该书的两卷,一卷于 1667 年在广东刻印,另一卷 1670 年于果阿刻印。”(The first of this work's two volumes was printed at Canton in 1667, while the second appeared in 1670 at Goa, a year after Intorcetta passed through India bound for Europe.) 根据笔者上面对该书的描述,可见这里有关殷铎泽翻译了《大学》、将《中国的智慧》并成一个较大版本出版了《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以及另一卷刻于果阿等的论述都有误。而在第 279 页作者再次提到:“《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广州, 1667; 果阿, 1670) (printed with the title *Sinarum Politico-Moralis*. Canton, 1667; Goa, 1670)”, 时间表述上有误。

- ⑮ 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该书的缩微胶片,但缩微处索引目录上写着该书是 1672 年于法国巴黎出版。笔者也曾怀疑,该中拉合刻本是于 1672 年在法国再版之时,才添加上了后面八页的孔子传;但是,基于《孔子传》最后一页上有殷铎泽中文印章以及“1669 年 10 月 1 日在果阿再次获许出版”(Goae Iterum Recognitum, ac in lucem editum. Die 1. Octobris. Anno 1669. SUPERIORUM PERMISSU.) 这样的字眼,《孔子传》1669 年刻于果阿无需置疑。另外,鉴于各家对于殷铎泽此书的版本描述中都没有提及该书的拉丁文版 1672 年于巴黎再版,因而存在这样的可能:在编写索引时,拉丁文版的出版时间被误记成 1672 年于巴黎出版的法文转译本的时间,因后者更为知名。

- ⑯ 笔者此处阅读的版本是德国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的藏本(M: Cc 2° 5),书中明确标明了此处的殷铎泽译文在法国再版的时间是 1672 年(PARISIIS, M.DC. LXXII.)。另外,据 Werner Lümann 介绍, Thévenot 的游记在巴黎刻印出版了两次: 1672 年第一版的刻印工是 Gervais Clousier; 1673 年第二版的刻印工是 André Cramoisy, 此人也是《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刻印工。第二版面世时《中国政治道德学说》一书的封面也被译成法语。详见: Werner Lümann. “Die Übersetzungen der Vier Bücher ‘durch die Jesuiten ins Lateinische: Couplet und Noel. Übertragungen in andere westliche Sprachen’ . In *Konfuzius. Aufgeklärter Philosoph oder reaktionärer Moralapostel?*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pp. 22-24; Lust 目录第 260、730 号对该书也有相关介绍。

- ⑰ Lust 目录第 724 号。该书的原始手稿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西文手稿部(Ms. Lat., 6277/1 et 2), 此外该书还有同一时间出版的多个印刷本,现藏于欧洲多个图书馆。笔者亲见的印刷本有五个,分别藏于罗马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埃尔兰根

大学图书馆和 HAB Wolfenbüttel 图书馆,另外也阅读了瑞士日内瓦大学图书馆藏本在 Google Books 上的扫描文档。在出版的时间地点(1687, 巴黎)以及书中的内容上,各个印刷本都保持一致。此外笔者是以罗马国家图书馆所藏印刷本为例(Collocazione: 13. 11.F.27),该书使用米黄色软皮革作封皮,书脊上有墨水书写的标题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已褪色),卷边装订,红色的喷色书边;此对开本使用那个时代的上等牛皮纸印刷而成,书页大小为 341 毫米 x 225 毫米,全书页码编排为: CXXIV, 108, 21, [3], 159, [1]; XX, 108 [即 110], [10], 书中还附有铜板画孔子像一幅以及折叠起来的铜板印刷的中国地图一张。此外笔者经比较发现,虽同为 1687 年在巴黎印刷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藏本(BE.4.G.7)与罗马的藏本内容一致,但内容上各部分的排列顺序却略有不同,而且奥地利的藏本为红色软皮封面并有卷边装订,金色喷色书边,在装订上更为精美。另外,书中还出现多种类型的页码形式并存、部分页码排序重叠以及前后页码不相衔接的现象,笔者据此推测:书中各部分内容应该是各自独立排版印刷,之后才又将各部分拼合成书出版的。另外,通过比较欧洲五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版本,以及与比利时汉学家高华士的通信讨论,笔者也发现在 17 世纪的欧洲存在着这样不成文的惯例:当时的“书籍”是以散页的方式(即处于无装订的状态)出售给买家,售出之后买家可以自己选择封皮的样式并按照自己喜爱的顺序安排书中各部分内容的顺序,然后才进行装订。这也是现在欧洲多家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各部分内容在顺序安排上各有不同的原因。另外,丹麦汉学家伦贝克曾出版《汉字的传统历史》(*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ript. From a Seventeenth Century Jesuit Manuscript*. Denmark: 1988.) 一书,书中收录了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部分手稿(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Latin, 6277),经他翻译考对认为这些手稿是由殷铎泽所作、论述了中国象形文字的发展历史,后来因礼仪之争的缘故,最终没有被允许收录进《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而遗留下来的残篇。

- ⑱ 笔者此处阅读的版本是德国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的藏本(M: Lf 92)。据孟德卫考证,该书的匿名编者可能是 Louis Cousin (1627-1707),刻印工为 Pièrre Savouret。该法文版后来又于 1784 年、1818 年以及 1844 年连同 29 页的短文“Lettre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一起于巴黎多次再版;另外,该法文版于 1691 年被转译成英文,以“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为题出版,此后又于 1706 年(可能还有 1780 年)再版;1818 年 Joseph Tela 出版了第二个英文转译本,题为“The Life and Morals of Confucius”。详见 David E. Mungello. “Aus den Anfängen der Chinakunde in Europa 1687-1770”. In *China illustrata.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1987, pp.67-68. 众多法语、英语转译本的出现,充分说明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在欧洲的受关注程度。

- ⑲ Lust 目录第 83 号。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在他的《中国文献题解》一书中也提及 Carlieri 在其书中收录了殷铎泽的《中庸》拉丁译文,题为“Scientiae Sinicae liber inter Confucii libros secundus”,参见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 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s*. Shanghai, 1867, p. xv; 另外, 伟烈亚力书中还提到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 在他“L' Invariable Milieu”一书中也收录了殷铎泽的这篇拉丁译文 (参见该书第 24 页), 参见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 xv.

- ②① Lust 目录第 742 号。笔者在这里阅读的是 Google Books 上的扫描文档 [2011-3-11]: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tdhCAAAAcAAJ&printsec=frontcover&dq=Sinensis+Imperii+Libri+Classici+Sex&hl=zh-CN&ei=2h2mTpulOuSZiQeG4ZCVDg&sa=X&oi=book_result&ct=result&resnum=7&ved=0CE4Q6AEwBjgK#v=onepage&q&f=false.
- ②② Lust 目录第 1007 号; 另可参见 Alexander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 xv.
- ②③ Oskar Nachod. “Die ersten Kenntnisse chinesischer Schriftzeichen im Abendlande”. In *Hirth Anniversary Volume. Asia Major, Introductory Volume*. Leipzig, 1923, pp.235-273. 转引自 Georg Lehner. *Der Druck chinesischer Zeichen in Europa. Entwicklungen i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p.13.
- ②④ 利用羁留广州和返回罗马途中逗留果阿的时间, 殷铎泽将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说》的《中庸》双语译本付印, 而根据 C. R. Boxer 的记载, 协助他刻印的是一名他从中国带去、洗名为保禄 (Paul) 的信徒, 在帮助殷铎泽完成刻印之后, 保禄又独自返回了中国。这位教友应该就是与殷铎泽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万其渊, 他也是后来在南京获得罗文藻主教祝圣的三位中国司铎之一。参见 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463.
- ②⑤ 莱布尼茨一直与 Daniel Papebrochius (1628-1714) 保持书信联系, 后者是《圣人通报》(Acta Sanctorum) 杂志的编辑, 他也是柏应理在鲁汶学习神学时的同学和挚友, 与柏应理关系密切。莱布尼茨在他与 Papebrochius 的通信中多次询问《中国哲学家孔子》的编订及出版的最新情况, 此处所涉及的两人通信内容详见: Wenchao Li, “Confucius and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in Germany”。此处特别感谢李文潮教授通过电邮慷慨提供给笔者这篇研究论文。
- ②⑥ Georg Lehner. *Der Druck chinesischer Zeichen in Europa. Entwicklungen im 19. Jahrhundert*, p.17.
- ②⑦ Georg Lehner. *Der Druck chinesischer Zeichen in Europa. Entwicklungen im 19. Jahrhundert*, p.18.

参 考 文 献

- [1] [法]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上)、(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年.
- [2] [法] 荣振华著, 耿昇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上)、(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年.
- [3] 张国纲、吴莉菁. 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 [4] 张西平. 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年.
- [5] Boxer, C. R. Some Sino-European Xylographic Works, 1662-1718 [J].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2 (De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 [6]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M].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Chan, Albert.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M]. New York & London: M. E. Sharpe, 2002.
- [8] Cordier, Henri. *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 [M].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1.
- [9] Couplet, Philippus.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CIENTIA SINENSIS* [M]. Paris, 1687. (Biblioteca Nazionale V. Emanuele II di Roma: Collocazione: 13.11. F.27;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Cote: O2N- 206 (A,3); Wolfenbüttel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M: Gv 4° 35; Erlangen-Nürnberg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00/2 OR-III 2 ad;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BE. 4. G.7)
- [10] D' Elia, Pasquale. *Fonti Ricciane* [M].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 [11] Golvers, Noël. *BUILDING HUMANISTIC LIBR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irculation of Books, Prints and Letter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XVII-XVIII cen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 [M]. Roma-Leuven: Edizioni Nuova Cultura, 2011.
- [12] Golvers, Noël. An unobserved letter of Prospero Intorcetta S.J. to Godefridus Henschens S.J.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Jesuit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Antwerp, 2 June 1672) [A]. In *Syntagmata Essays on Neo-Latin Literature in Honour of Monique Mund-Dopchie and Gilbert Tournoy* [C].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3] Intorcetta, Prospero.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M]. Guamcheu, Goa, 1667/1669.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Jesu Romae: Jap-Sin III, 3. 3a, 3b)
- [14] Labruné, Jean de.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ie De La Chine / Confucius* [M]. Amsterdam: Savouret, 1688. (Wolfenbüttel: M: Lf 92)
- [15] Lehner, Georg. *Der Druck chinesischer Zeichen in Europa. Entwicklungen im 19. Jahrhundert* [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 [16] Lust, John.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M].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1987.
- [17] Mungello, D. E.. *Th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18] Antonio, Possevino.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a... ex typographia apostolica vaticana* [M]. Romae: 1593. (Google Books 扫描文档)
- [19] Standaert, Nicolas.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M]. Leiden • Boston • Koeln: Brill, 2001.
- [20] Thévenot, Melchisedec.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Qui N'Ont Point Esté Publiées, Et qu'on a traduit ... des Originaux des Voyageurs François, Espagnols, Allemands ...* [M]. Paris: Moette, 1696. (Wolfenbüttel: M: Cc 2° 5)

[作者简介] 罗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作者电子信箱] luoying0227@hotmail.com